

● 马西林 王钊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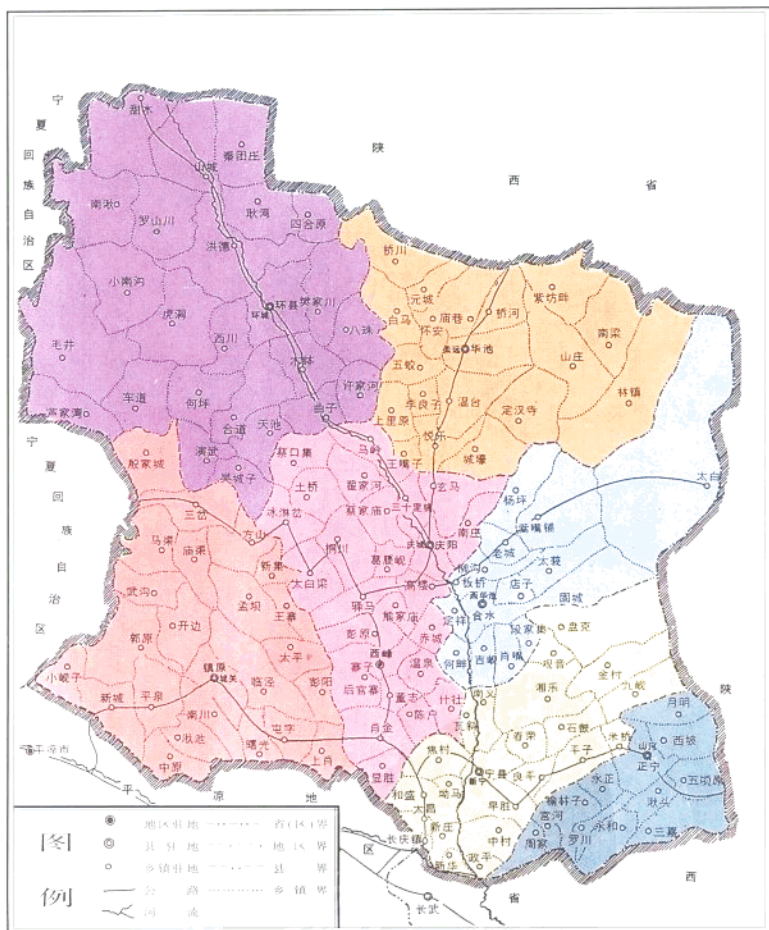
陇东革命斗争史

(修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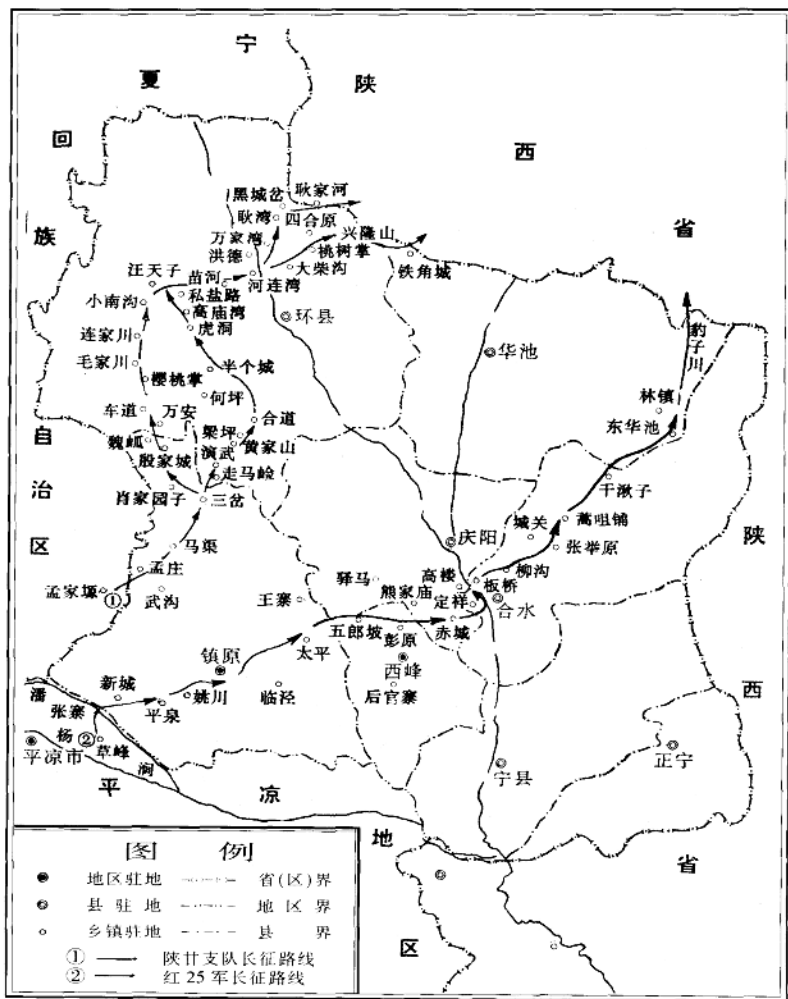
甘肃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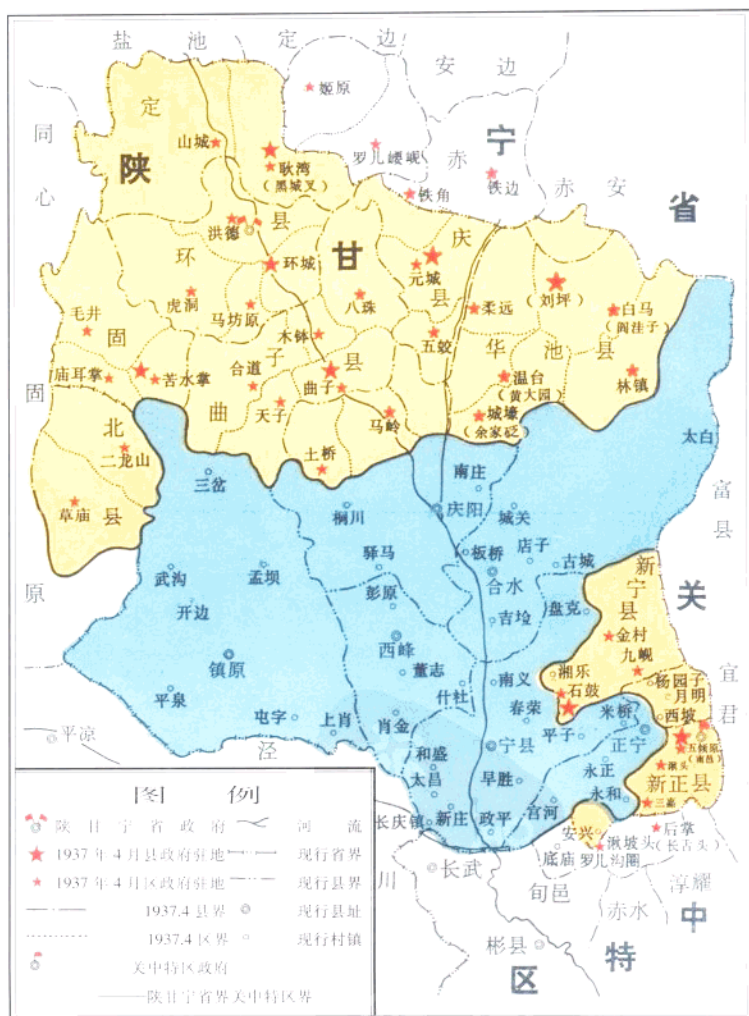
庆阳地区行政区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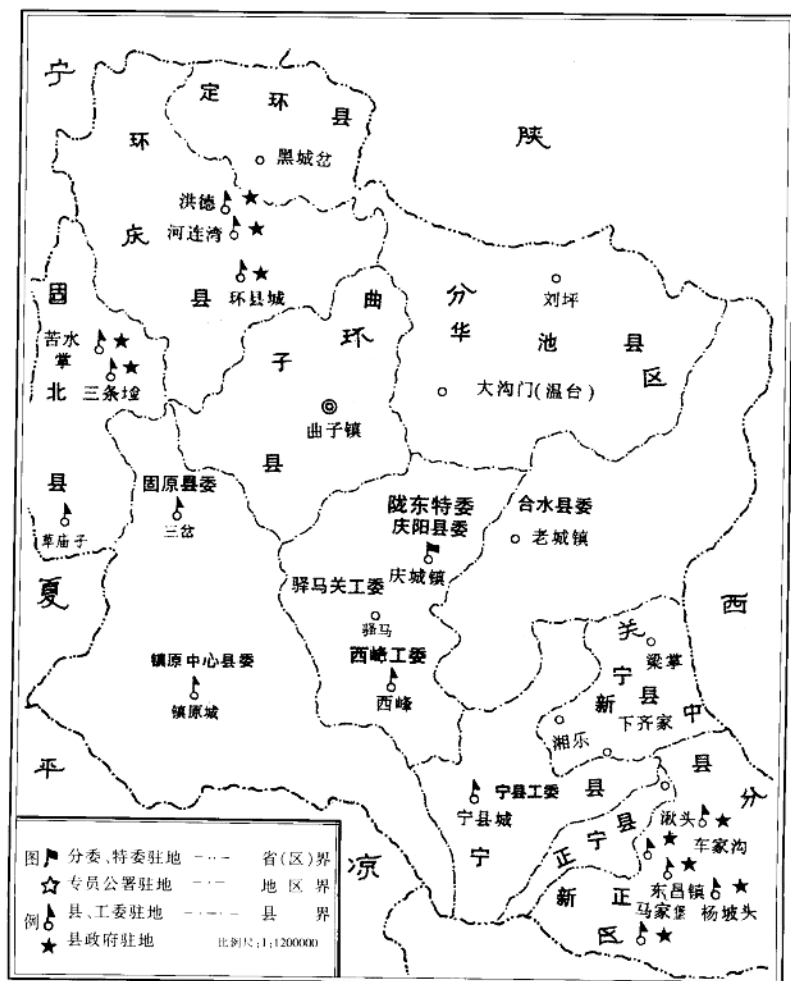
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 长征过庆阳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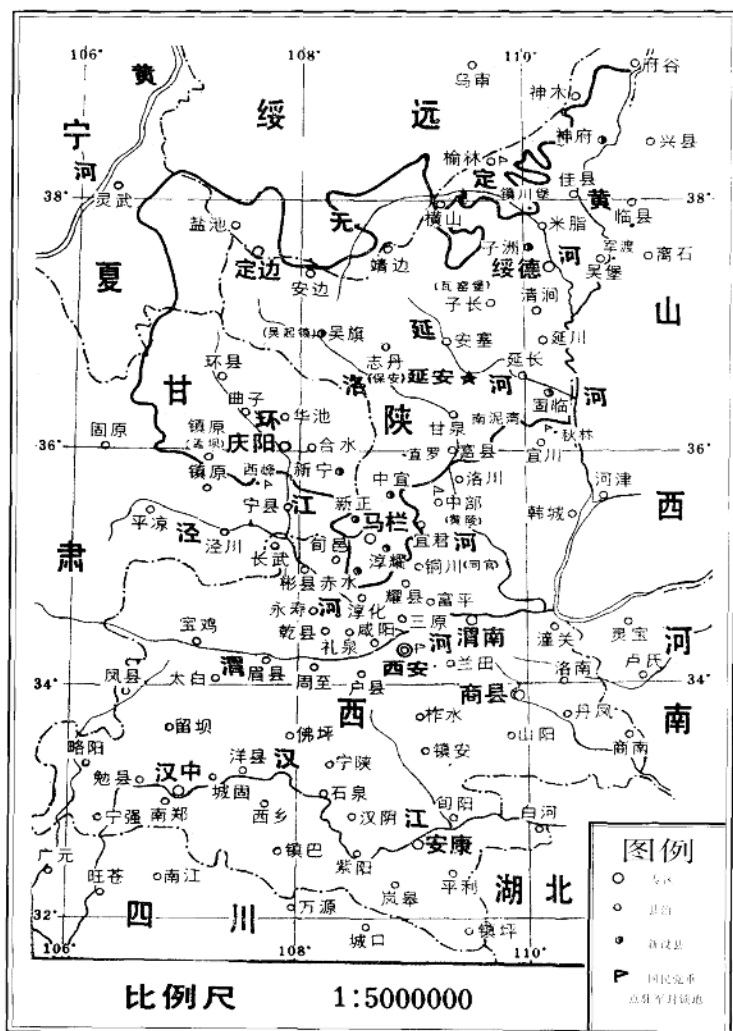
陕甘宁省、关中特区时期所辖陇东苏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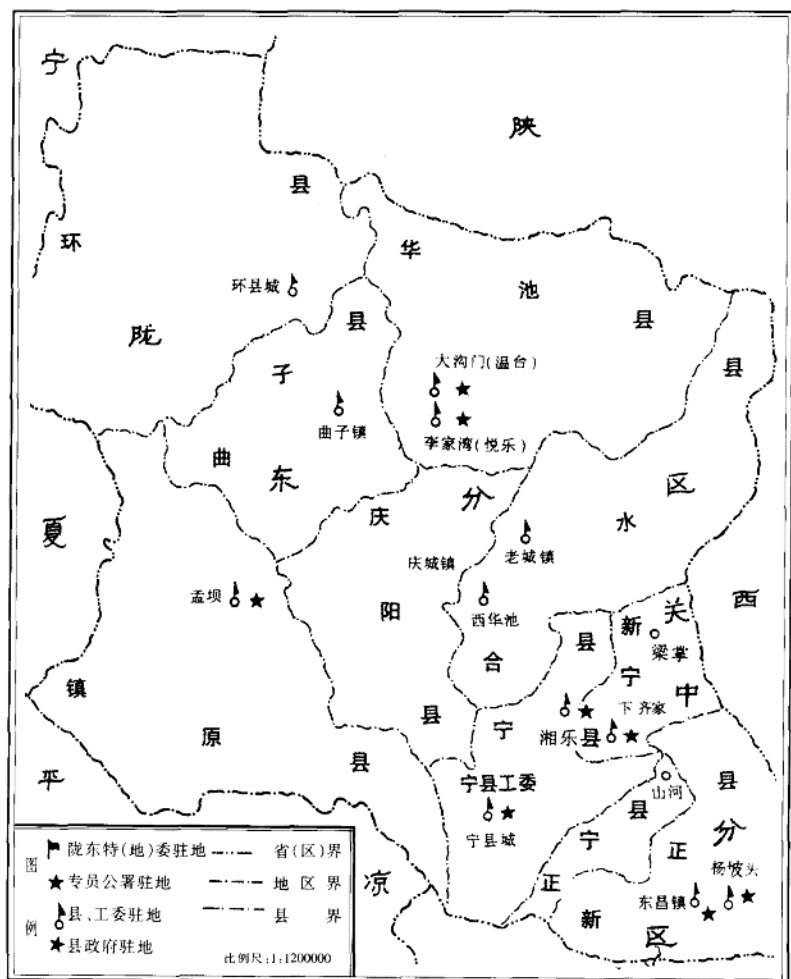
庆环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及陇东国统中共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1937.9-1940.8)



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图(1941 年)



陇东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 (1940.8-1945.8)



前 言

陇东革命斗争史,是庆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甘肃陇东这块黄土地上,为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历史。陇东革命斗争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是一条长河。掌握陇东革命斗争史,不能不了解悠久灿烂的庆阳历史。

庆阳位于甘肃省的最东端,习惯上称其为“陇东”。远在 20 万年以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从事狩猎和采集,我国的第一块旧石器,就出土于华池县赵家岔。庆阳为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活动的区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夏商时这里属《禹贡》所列“九州”中的雍州之地。周时称北豳,先周首领不窋及其后裔鞠陶、公刘曾经长期在这里“务耕种,行地宜”,复兴周道,开创了中华民族早期的农耕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地属义渠戎国,秦代为北地郡。到了汉代,农牧业进一步发展,庆阳已是“沃野千里,民以富饶”的地方。隋代改置庆州,唐代沿袭,宋代始为庆阳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中华民国建立。1913 年(民国 2 年),废除府制,庆阳归属陇东道;1927 年(民国 16

年)废道,改属泾原行政区;1935年,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西峰设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在华池县南梁成立,1937年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0年更名为陇东分区。解放后,先成立庆阳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1年更名为庆阳区专员公署,1955年又更名为庆阳专员公署,1978年10月改为庆阳地区行政公署至今。行署所在地西峰镇于1985年改为县级市。

悠久的历史给庆阳地区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存。发掘于庆阳县三十里铺的“环江翼龙”化石和合水板桥的“黄河古象”化石,使世界为之瞩目。秦长城横跨华池、环县、镇原3县进入固原,沿途烽燧相望。秦直道沿子午岭纵越正宁、宁县、合水、华池4县,遗迹至今尚存。开凿于北魏时的北石窟寺,为甘肃四大石窟之一。环县、华池、肖金、宁县等地有唐宋至明朝的砖石塔,结构严谨,姿态雄伟。境内尚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齐家文化的古遗址和历代石刻、墓葬及古生物化石近千处,成为宝贵的历史见证。庆阳历代名人辈出,傅介子、傅玄、王符、李梦阳等人,留下了世所称道的著作和政绩。悠久的历史也孕育出了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皮影、剪纸、道情和民歌堪称陇东文化的“四绝”,是祖国文化艺术花苑里盛开不衰的奇葩。

庆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人民久有习兵尚武精神。北接宁夏的环县,山岭连绵不绝,史称“实银夏之门户,幽宁之锁钥”;东靠陕北的合水县,“原阜盘旋,沟涧辐辏”,与

子午岭浑然相接，成为天然屏障；南临关中的宁县，史说“联络关陇，襟带邠岐，川谷高深，地形险固”；西当六盘山的镇原，“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战略地位也很突出。险要的地理形势，使庆阳地区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人民习兵尚武精神和勇于反抗意识得以陶冶和磨炼，威武不屈、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深深根植于这块古老的黄土地。

发生于现代史上的革命斗争，是庆阳历史上壮丽的一页。这段历史，从1925年革命先驱王孝锡浴血播火开始，到1949年7月庆阳全境解放为止，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党在陇东的早期活动时期、陕甘边时期和陕甘宁边区时期三个阶段。

党在陇东的早期活动，始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1925年，出生于宁县太昌镇的青年王孝锡在家乡组织了“青年社”，在苦难深重的庆阳大地上建立起了第一个进步组织。当年入党后，他于1927年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第一个农村支部——“中共邠宁支部”，宣传革命真理，点燃革命火种。1928年，王孝锡不幸被捕牺牲，党在陇东的革命活动受到严重挫折。

1930年初，刘志丹、谢子长到陕甘边界宣传群众，开展兵运活动和武装斗争，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县南梁成立。在打破敌人数次“围剿”后，1935年8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为北上抗日的红军和党中央提供了落脚点。

1935年10月，长征红军经宁夏固原进入庆阳地区，途经镇原、环县、华池3县的20多个乡镇，行程约260公里。1936年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最后一战——环县山城堡战斗，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全国性抗战爆发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定名为陕甘宁边区，陇东根据地即成为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革命斗争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陇东，在抗日战争阶段，党政军民万众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抗日民主制度不断完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文艺事业一片辉煌，区内经济空前繁荣。这对我党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粉碎其军事进攻，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陇东老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光明和进步的地方之一。在解放战争阶段，陇东党政军民一方面就地开展对敌斗争，配合野战部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屡次进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另一方面随军作战和踊跃支前，为解放大西北和解放全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烈士鲜血洒满了老区的土地，老区人民倾其所有养育了革命。

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庆阳老区人民在党中央、毛泽东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在同国内外敌人和各种艰难困苦进行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中，创造了慷慨悲壮的英雄业绩，炼就了垂裕后昆的老区精神。老区精神的内涵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无论是在创建人民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

还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年代，老区精神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大政治优势。

对于陇东革命斗争的历史，建国之后，地方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各级党委部门设立专门机构，组织专业人员从事征集、挖掘和整理工作，形成了一批内容比较全面、史料比较翔实的资料。过去曾在陇东这块热土上战斗和生活过的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革命的老同志也陆续写作出版了感人至深的回忆文章。区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有志于此的党政干部，或以理论文章或以文艺形式，对某些方面作过难得的反映。研究陕甘宁边区历史和甘肃近现代史的有关专著也涉及到了陇东根据地的部分史实，等等。总之，以正史形式比较准确完整地反映陇东老区革命斗争历史的条件成熟了。这不仅仅是为了对历史负责，同时也是为我们这一代和黄土地的后人负责。

本书的编写，我们是把庆阳地区的这一段历史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和研究的。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庆阳老区的革命斗争不能脱离中国革命斗争而独立存在，所以本书大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分期仍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保持一致。但由于这是庆阳老区这一特定地区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斗争史，所以又有体现庆阳老区革命斗争特点的历史分期。为了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采用了寓庆阳老区革命斗争历史分期于中国革命史分期之中的作法，这应当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在翻检凡是能拿到手的大

量资料和反复印证的基础上,我们以目前看法基本一致的材料为依据,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为主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出庆阳老区这一段历史的进程和基本规律,并从中挖掘出在血与火的熔炼中铸就的精神财富,作为主旨贯穿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之中,以期收到掌握历史和得到教益之效——历史,从来就是一面镜子。

著 者

二〇〇一年三月

修订说明

本书于1993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著者在《后记》里就说过：“由于本书是关于庆阳老区革命斗争的第一本史书，也由于工作条件和水平所限，尽管大家抱有良好的愿望，做了认真负责的工作，但疏漏以至错讹之处肯定存在。为对历史和后人负责计，恳请读者热心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这绝非套话。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疏漏和错讹”是“肯定”而不是“可能”存在。这话出自著者之口，原本表明两点：一是给读者以请求——注意发现问题，不吝提出指正；二是给我们加责任——注意吸收意见，适时修订本书。因为，著者有一个郑重的承诺：“为对历史和后人负责计”。

春秋易逝，转瞬8年。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注意听取反映，而且主动征求过熟悉这段历史的一些同志的意见。其中，彭得琇、高文和曹清珂同志校阅了全书，提出非常宝贵的意见。他们或在书上修改后将书送达我们，或者写长信陈述具体意见，提出商榷之处。这种难得的关心和认真负责精神令我们感动。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这次修订，对全书的纲目和体例不予改动，主要是对文字的订正和史实的校核。另外，还适当增补了一些内容。

文字的订正比较好办，错的和不准确的改过来就是了。但此事极须仔细，因为这也关系到史实的准确与否。例如，原书第59页有一句是“红军攻战腊子口”，将“占”误印为“战”，就把占领说成了正在战斗，显然与事实相左。又如第69页有个括号内的文字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在“团”“红”二字之间少了一个“和”字，就造成了“红二十八军属于红十五军团”的误会，其实当时它们并无隶属关系。而第72页倒数第4行在“2”和“4”之间缺少一个小数点，当时的环县，人口就由2.4万变成了24万人，真乃大谬！此类差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真令我们负疚。本书初版的时候，由于经费和印刷条件所限，著者虽守在车间校对亦不能避免其误，实在让人遗憾。一个差错，就可能会给有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带来长时间的误导，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首先要负责任的。带着歉意，这次修订除我们反复订正外，还特聘了汉语讲师曹孝民先生在文字上把关，我们向他致谢。

史实的校核就比较费事了。我们的原则是，不论读者指出的还是不曾指出的，对全书史料一律再核实。这样，对有关数百万字的资料和图书几乎全部翻检了一次，不少反复查阅，互相印证。核查表明：本书初版本在史实方面尚无大的问题，某些有争议之处主要是史料的来源和对其看法的不同，需要进一步辨析和确认。陇东根据地时

期的革命斗争相当错综复杂,由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和巨大的物质困难,当时留下来的文字史料不多,相当多的史料来自大量的采访记录和回忆文章,搜集整理和鉴别考证的任务十分繁重。党史部门的同志们对此进行了长期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目前说法矛盾、看法不一、有待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而写史从来都不会在一切都有定论之后。所以,对现有资料的鉴别和确认,实属至关重要。这方面,我们的原则还是初版本《前言》中所说的“以目前看法基本一致的材料为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基本是重正史而轻野史,重党史部门研究成果而轻采访回忆材料,重公开出版著述而轻内部印刷刊物。对一则有争议的史料,佐证有三的一般采用,佐证有二的反复辨析,孤证的一般舍弃。总之,慎之又慎。基于上述原则,此次修订,我们对提出商榷的几处史实,一一给予再辨析。其中,有两则需要向读者交代。

一则是关于西北根据地的游击区在陇东所含县份的问题。本书初版本采用的是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吴志渊著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的观点,即在西北根据地游击区30个县中,属陇东境内的有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5个县。吴先生的依据是张志宏著的《陕北根据地概述》和《地名知识》1995年第2期第30页的记述。曾经长期在陕北生活和战斗过的陕北人吴先生的观点,我们认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935年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统一之际,国民党已在陇东设置6县,即上述5县再加上镇原县。这6县以及固原、泾川、灵台3县均由国民党

甘肃省第三区专员公署管辖。当时的陕甘边苏区陇东也建立了6个县,其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有华池、庆北、新宁、新正、永红县,建立临时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是合水县。在创建苏区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要把已建立独裁统治的国民党的地盘,一块一块地“赤化”过来,“赤化”过来的地方就叫根据地,是革命的战略依据。陇东苏区6县就是如此。这6县,除新正县部分地方和永红县大部属陕西旬邑县外,其余全包括在国民党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4县之中。所谓游击区,当然是苏区红军到国民党的地盘上去游击,必须以国民党的区划来界定。那么,为什么含环县而不舍镇原县?这还得以事实来回答。在两块根据地统一之前,环县已经是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一个战场,而此时的镇原则相对平静,国民党的势力还严密地控制着该县。在环县,一般性的不说,仅大的战斗就有1934年11月的红军长途奔袭曲子镇和1935年初的老爷岭上长达月余的巧布疑兵游击战(详见书中内容),陕甘边苏区两次反“围剿”斗争,环县都是其重要战场。当然,这与环县紧靠苏区这一地理位置有关。处在这一时期的镇原县,不能说没有斗争,但比较大的仅是1934年夏,平泉青年农民王子厚联络南三镇400余人,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而进行的抗捐抗税活动,尚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性质。王子厚变卖田产买枪开展革命斗争,其主要活动是在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南三镇之后,那时,西北根据地已经形成。鉴于以上事实,陇东游击区含环县而不舍镇原县是对的,故不作修